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2.1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階級重現

Göran Therborn

Komtar的(非)公民

Aya Fabros

秩序中的混亂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 > 英語與社會科學的霸權
- > 秘魯與羅馬尼亞的社會學
- > Ulf Himmelstrand, 1924-2011
- > 歷史一隅：不平等的女人參與
- > 人權：南高加索的父權
- > 公共社會學：人文社會科學新憲章
- > ISA: 社會學新鮮人
- > Women's Worlds
- > 巴西社會學會



第二卷 / 第一期 / 2011.9

GDN



> 主編的話

當我在寫這段文字的時候，利比亞的社會瓦解了，我所有的思緒開始轉移到關注到底下一刻還會發生什麼事情。不僅是關注利比亞而已，還包括其他阿拉伯國家。動亂似乎蔓延到全世界了，因此，在這期通訊中，Göran Therborn以全球的角度去診斷不平等問題，並宣稱階級政治將重新來臨。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分析了歐洲，特別是英國的暴動事件。Aya Fabros刻劃了在馬來西亞的亞洲移工的面貌。Gohar Shahnazaryan分析後蘇維埃社會中、戰爭頻仍的南高加索地區的女權運動所面臨的挑戰。若要說本期有什麼核心主題的話，那我會以indignados這個字來涵蓋本期的內容。

全球對話繼續全球社會學的相關辯論。Renato Ortiz檢視了英語的霸權地位，Ari Sitas和Sarah Mosoetsa則描述了南非社會人文科學的新憲章。秘魯的Nicolás Lynch Marian Preda和羅馬尼亞的Liviú Chelcea則重新檢視了社會學和過去威權政府統治的複雜關係。

Jennifer Platt描述ISA女性參與的歷史。Elisa Reis和Ann Denis為大家報告兩場生動的會議：巴西社會學會和Women's World；Emma Porio則以社會學新人為題撰文。此外，我們也為文悼念社會學家Ulf Himmelstrand。

起初，我們原本設想全球對話是一份軟性的通訊刊物，但是現在看起來她更像是一份以社會學視野分析社會脈動的讀物。我們出版了11種語言，編輯群來自全球各地，一同做出了貢獻。此外，數位科技讓昨日的不可能變成可能，像是跨洲對於執行委員的訪問。請大家看看：<http://www.isa-sociology.org/journeys-through-sociology/>

在Facebook和ISA網站可以全文閱讀全球社會學。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	2
> 不平等與抗爭	
階級重現	3
Komtar的(非)公民	6
秩序中的混亂	9
> 全球社會學辯論	
英語與社會科學的霸權	11
> 各國的社會學	
羅馬尼亞社會學	12
秘魯社會學的轉向	13
> 紀念Ulf Himmelstran	
奈及利亞社會學之父	16
來自前會長的弔唁	17
> 特集	
歷史一隅：不平等的女人參與	8
人權：南高加索的父權	18
公共社會學：人文社會科學新憲章	20
> 會議與報告	
社會學新鮮人	21
Women's Worlds	22
巴西社會學會	23

> 編輯委員

主編：Michael Burawoy
執行編輯：Lola Busuttil、August Bagà
副主編：Margaret Abraham、Tina Uys、Raquel Sosa、Jennifer Platt、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Izabela Barlinska、Louis Chauvel、Dilek Cindoglu、Tom Dwyer、Jan Fritz、Sari Hanafi、Jaime Jimenez、Habibul Khondker、Simon Mapadimeng、Ishwar Modi、Nikita Pokrovsky、Emma Porio、佐藤嘉倫、Vineeta Sinha、Benjamin Tejerina、伊慶春、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Sari Hanafi、Mounir Saidani
 巴西：Gustavo Taniguti、Juliana Tonche、Pedro Mancini、Fabio Silva Tsunoda、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Andreza Galli、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印度：Ishwar Modi、Rajeev Gupta、Rashmi Jain、Uday Singh
 日本：芝真里、塩谷芳也、姫野宏輔、高見具広、速水奈名子、岩館豊、池田和弘
 西班牙：Gisela Redondo
 台灣：何經懋
 伊朗：Reyhaneh Javadi、Saghar Bozorgi、Mitra Daneshvar、Shahrad Shahvand
 俄羅斯：Elena Zdravomyslova、Elena Nikofova、Asja Voronkova
媒體顧問：Annie Lin、José Reguera

> 全球不平等： 階級重現

by Göran Therbor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英國, Linnaeus University, 瑞典, 橫濱世界大會計畫委員



前總統 Mbeki 看著 Johannesburg 急速報增的貧窮階級。

過去二十年來，世界上的貧窮國家處境似乎並不太差。中國、印度、東南亞等被國際經濟組織稱為發展中的亞洲國家，從1980年代晚期開始就快速的成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在上個世紀末的發展狀況相當不幸，但是從2001年開始，他們的成長速度已經比全世界還快，超越了那些已開發國家。拉丁美洲和中東也分別在2003年和2000年後迅速發展起來。除了後共產主義的歐洲國家，其他新興的發展經濟體也安然度過由Anglo-Saxon銀行家所搞出的金融危機。

> 民族與階級

我們正在歷經一個歷史轉向，這個轉向不只是地緣政治的，也和不平等有關。19世紀和20世紀全球發展不均的歷史告訴了我們：人類不平等與否，和住在哪裡是密切相關的。在西元2000年之前，我們估計出有80%的家戶所得不平等是因為國家不同而導致(Milanovic 2011: 112)。然而現在事情不同了，整體說來，全球的不平等趨勢有所減緩，而且富人與窮人之間的差距已經停止拉大了，但是國家之間的貧富不均卻正在惡化之中。這也正好駁斥了「全球化」理論或是「科技變遷」的決定論。

上述現象導致了階級的重現。這是一個對於全球不平等來說越來越有決定性力量的因素。階級向來就非常重要，只不過在20世紀，雖然說有「無產階級世界主義」，但是民族國家內的階級組織和階級鬥爭大過於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隔閡。現在，國家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但階級之間卻越來越分殊。

全球財富分配的階級面向在1990年代愈益重要。

>>

這個時期也正是中國不平等急速惡化的年代，因為其比蘇聯更靠近資本主義。而同時印度則較為傾向均等化，但是也造成鄉村和城市內部的不平等。墨西哥和阿根廷則是向新自由主義靠攏。一份IMF (2007: 37)的報告指出：世界上在90年代財富有增加的人，是不論在富裕國家或貧窮國家之中的前5分之1人口，其他5分之4都沒有。

其實，有最明顯變化的是在收入金字塔頂端的那些人，也就是說，前百分之1的人和其餘的人、前0.1%或0.01%和其餘的人之間，差距明顯擴大。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最近就指出 (Vanity Fair May 2011)：美國最富裕的前1%人擁有全國40%的財富、擁有了近四分之一的國家總收入、也幾乎都是國會議員。上個世紀末，前1%人的有錢人也不過才擁有了15%的收入，而印度則是9-11% (Banerjee and Piketty 2003)。

中國、印度和其他亞洲國家的不平等趨勢在新世紀仍然會繼續下去，美國也是如此(Luo and Zhu 2008; Kochanowicz et al. 2008; Datt and Ravallion 2009)。例如，印度快速的經濟成長並不會為最貧窮的那百分之5的人帶來什麼好處，因為在印度仍然有3分之2的女性體重過輕，而且她們一生皆如此。1995年就是這個情況了，2009年還是一樣，沒有改變 (UN 2011: 14)。2000年之後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成長並沒有解決貧窮問題。全世界營養不良的人口從6.18億增加到6.37億，占全球人口的16% (UN 2011: 11)。糧食價格也持續飆漲。另一方面，富比士雜誌在2011年3月慶祝他們締造了兩項新紀錄：在所列出的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人數達到1210人，總財富4.5兆，比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德國的GDP還多。這些人之中，413人是美國人，115人是中國人，101人俄羅斯人。

然而，不論在經濟或是技術上，不平等的持續惡化現象似乎無法避免。在世界上經濟不平等最為顯著的國家之中，只有拉丁美洲是唯一不平等有減緩趨勢的地區(CEPAL 2010; UNDP 2010)，這是因為有很大的政治因素(Cornia and Marorano 2010)，對於1970年代和1980年代軍事獨裁實施之新自由主義有著強烈的反感，此外，多少也和民主化的進程有關。在阿根廷、巴西、委內瑞拉等國的重分配政策之所以可以實行，也是因為之前富人獨占了所有財富。這表示出了階級的重要性。

另外一個比較國家之間的階級關係的方法是看人類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ex)。這個指標包括了收入、生活期望、教育等。這個指標的計算很複雜，誤差邊際很大，不過，這對於瞭解全球的不平等來說，是很有價值的。例如，最貧窮的1/5美國人，其指標比在玻利維亞、印尼、尼加拉瓜的富人還低，也低於巴西和秘魯的後40%的人，和哥倫比亞、瓜地馬拉、巴拉圭差不多(Grimm et al. 2009, Table 1.)。

從分配正義的角度來看，除了財富集中這個理由之外，還有其他原因會使得階級重現。種族主義和性別偏見，或許在許多地方仍然可見，但是已經沒那麼明顯了。明顯的例子是南非的種族隔離已經減少許多。南非是一個很好用來解釋制度化種族主義後所造成的階級不平的例子。勇敢的世界銀行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c (2008: Table 3)等人指出：全球1990-2000年，家戶所得的吉尼係數大約是65-70，但是在2005年約翰尼斯堡卻是75！這是以消費支出來計算的，而這種方法通常比以收入來計算的方式還要來得會低估不平等的現象(UN Habitat 2008: 72)。儘管有邊際誤差，但是若要說，約翰尼斯堡在後種族隔離時代的不平等現象和全球的情況類似，這並不為過。

> 階級政治的四條途徑

階級最有可能以至少兩種方式復甦。這兩種方式差異很大，分別是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兩種方向。而這兩種又分別有兩種變化。第一，在意識形態上具有宰制力量的中產階級有可能構成全球的中產階級，佔據世界上的財富，像是買車子，買房子，買電子消費用品，以及出國旅行。雖然這些全球性的高級消費會給具有環境意識的人帶來困擾，不過那些商業人士和商業機構卻是垂涎欲滴。中產階級的消費主義，對於商業利潤而言有著很大的益處。這些商業目標並非不可能，但是他們卻低估了目前經濟隔離和排他所可能帶來的社會爆炸性。

第二，中產階級和富人之間日益增大的差距，使得前者在消費之前會先進入政治場域。最近幾年我們在歐洲已經看見一些端倪(中產階級走上街頭、發動革命)，至少，這在1848年之後仍未發生。許多中產階級在社會經濟上已經做出反擊，像是反對智利的Allenda和委內瑞拉的Chavez，或是最近美國的Tea Party。和自由派的神話相反，中產階級的社會運動並沒有什麼民主的動機，泰國2008的黃衫軍，以及在智利和委內瑞拉等地都可見這個現象。

然而，其他的中產階級卻敵視寡占、裙帶資本主義和寡頭政治。在烏克蘭的橘色革命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但是，2011年春天的阿拉伯革命也包括了為數可觀且重要的中產階級。資本主義的排他性、獨後有前人的體制，可能會引起憤怒的中產階級進入政治場域，並帶來改變。

另外一個可能的方向是來自工人階級。歷史上的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了，並伴隨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出現，這由馬克思在19世紀中預測的一樣。歐洲和北美現在正去工業化之中，財務資本主義正在公部門快速成長，工人階級被分化、打敗、士氣

>>

低落。經濟分配的極化以及國家之間不平等的增加，在北大西洋地區造成了階級政治的復甦。

工人階級的重現也在中國發生。在這個全世界的製造工廠之中，工人來自不同的省份地區，被戶口制度給限制住。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成長也使得工人更加壯大(Pun Ngai in Global Dialogue 1.5)，而中國政府的官方仍聲稱是社會主義。所有人都在猜測其未來會怎麼樣。但是分配衝突、遷徙、移民仍是老樣子。

第四條路，則是必須從非洲、亞洲、拉丁美洲中的不同和動態中找出規律。由於識字率的提升、通訊的新方法，社會運動面臨到了很大的阻礙：族群、宗教、正式與非正式僱用關係，以及活動的分散，例如像是血汗工廠。可是社運組織、動員、集結的障礙並非無法克服。印度有越來越多的自我僱用現象、泰國的紅衫軍運動成為了2011年大選的一股重要政治勢力。而人民階級已經幫助誕生了中間偏左的政府，像是在巴西或其他拉美國家。

這四條道路的每一條，都非常具有社會學得意涵。全球中產階級消費主義、中產階級政治反抗、工業階級鬥爭等等，另外還有階級妥協，歐洲、中國、東亞跑走了，而且最後產生了異質的大眾階級動員(Cf. Enrique de la Garza and Edward Webster in Global Dialogue 1.5)。將來最有可能的現象就是這四條路都可以大步向前的。反而相對的重要性不只是一很難預測，而且在衡量資料證據和評價意義上都爭議。

然而，民族國家制度還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組織模式，而且階級衝突仍然發生在國家內部。新的全球不平等轉向，就意味著，在人類的生活，階級將會重現，國家將會沒落。

References

Banerjee, A., and Piketty, T. 2003. "Top Indian Incomes, 1956-2000", B R E A D working paper, <http://ipl.econ.duke.edu/bread/papers.htm>.

CEPAL, 2010. La hora de la igualdad. Santiago de Chile, CEPAL.

Cornia, G.A., and Martorano, B. 2010. Policies for reducing income inequality: Latin America during the last decade. UNICEF Policy and Practice Working Paper. New York: UNICEF.

Datt, G., and Ravallion, M. 2009. "Has India's Economic Growth Become More Pro-Poor in the Wake of Economic Reforms?" ,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5103, www.worldbank.org/.

Grimm, M. et al. 2009. "Inequality in Human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32 Countries" ,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Working Paper 519, www.lisproject.org/publications/wpapers.

IMF 200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ober 2007. www.imf.org

Kochanowicz, J., et al. 2008. "Intra-Provincial Inequaliti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 Faculty of Economic Sciences, University of Warsaw, Working Paper no. 10/2008. www.wne.uw.edu.pl

Luo Xubei and Zhu Nong 2008.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A Race to the Top" ,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700. www.worldbank.org/

Milanovic, B. 2008. "Even Higher Global Inequality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48:2.

Milanovic, B. 2011. 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New York, Basic Books.

UN 2011.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1. www.un.org/

UNDP 2010. Regional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www.undp.org

UN Habitat 2008. The State of the World Cities 2008/9. www.unhabitat.org/



> Komtar的(非)市民： 馬來西亞的自主移民

by Aya Fabros, Research Associate with 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菲律賓

在馬來西亞檳城的Kompleks Tun Abdul Razak (KOMTAR) 原本是一座衰敗的建築物，如今移民把它活絡了起來。雖然外國觀光客出入頻繁，但它絕對不是典型的觀光景點，用來提供你看一下全球城市的骯髒的一面。整齊的劃分的空間讓Komtar像是新加坡的Lucky Plaza或是香港的Victoria Park，反應出了移民工人

的日常生活實踐，在當地討生活，觀察著跨國現象，體驗著全球化。

除了名聲遠播之外，Komtar有其自己的秩序。政策的限制之下，移工群體自己分配自己的生活空間。在一樓的某些角落，尼泊爾的小販賣部提供給尼泊爾人一處會面的場所，吃著咖哩和momos，喝著飲料，聽著Kath-

mandu的音樂。在主要的大樓裡，二樓是緬甸區，三樓是印尼，四樓則是菲律賓。

每個群體都知道其他群體位於什麼地方，所以存在著一種未被言明的秩序，一種亞洲的系統化混雜。在那邊可以找到batik和bagoong，還有緬甸的出版品和翁山蘇姬的新聞。雖然有些地方沒有被承認，像是中國城和小印度



Komtar曾經是檳城最主要的購物中心，雖然現在已經失去昔日的光環，但是仍然還是地標。因為座落於市中心，又是最高的大樓，所以其現在是檳城全球化大廈，是一棟移民據會得開放空間。

，不過，當你走進去繞一繞，會發現那個地方不只是區域性的，還是跨國的。跨越疆界藩籬的社會互動相當平常。這就是最素樸的全球化。

在馬來西亞，估計約有4分之1的工人是pekerja asing (移工)，在工廠、農場、服務業裡工作。儘管人數眾多，馬來西亞也需要他們，但是移工仍然不被重視，甚至被忽略。他們僅僅是過客，僅僅是臨時工，雇主可以有權決定他們何時要被遣返回國或是可以留下。一位工人就這樣觀察到：「他們可以全權掌握工人的命運，憑他們高興去挑選或是解僱我們。但是我們卻一點也不能挑選雇主，甚至有問題想離開時也不能離開。」

當工人承認他們到馬來西是去工作的同時，他們也說他們並沒有自由(parang walang laya)，像是古時候的奴隸一樣。大老遠跑來找工作，一到就被限制了人身和移動的自由。他們要被限制在工作場所和居住地，被孤立起來，高度依賴雇主和仲介，但是這些人卻會任意的沒收工人的護照，用遣返去威脅他們。以恫嚇、絕望、孤立去使他們順服。結果，移工發現，來工作之後並沒有比較有保障，反而處於更危險的狀態之中。

在Komtar的移工要全力與這些束縛限制搏鬥，並且試圖找回自己的公民身份和能動性。在此，他們不再只是被剝去認同的工人，不再只是在生產線上、商店裡面或是幫傭的勞動身體，他們不是其他人的附屬物，也不是什麼非法的傭人，而是一個個具有清晰臉孔的菲律賓人、緬甸人、尼泊爾人。他們也是消費者，有購物的自由，並把辛苦掙來的錢寄回家鄉。他們也需要和朋友相互安慰和鼓勵，交換意見，聊聊每天的工作以及自己國家的總總。他們也會上教會、參加聚會，辦活動，張貼訊息、更新資訊等等，這是一個活生生的社區。

移工無可選擇地在他們也未必喜歡的地方住下，卻被認為是「危險且骯髒」的。即使如此，他們還是繼續在他們的空間，過他們的生活。可是還是會被例行性的突擊檢查、警察臨檢以及監控所干擾。然而，商家賦予這個空間新的意義，強調商業的重要性，否則，「你要他們到哪裡去呢？」

走下樓，在一間咖啡廳裡面，兩個年輕人相互打比較了一下彼此剛從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拿到的卡，等待其他同伴載他們到Alor Star去探視被居留在那邊的親戚和朋友；走上樓，會看到一張臨時用來玩tongits遊戲的桌子，在另一間房間，菲律賓人則唱著木匠兄妹的著名歌曲：Top of the World。

來Komtar的人總是隨意駐足，有時也不一定要買東西。一個菲律賓人說：「當你來到馬來西亞，會覺得孤零一人，可是到了Komtar，你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以這個意義來說，Komtar像是離鄉背井知人的集散地。在這裡，分散各地的工人可以一起見面。這裡沒有移工的集體意識，也沒有什麼共同的偉大計畫，有的只是彼此相互照應，一起填補那個由於被歸類為非公民身份而產生的空白。在這裡，從緬甸來的移工建立了「喪葬志工服務」、醫療支援，建立正式組織，因為已經有無數的個案顯示他們沒辦法得到這些基本的服務。其他自願性的組織則提供心理上的協助與幫忙，並同時一起舉辦社會文化活動。

Komtar仍然繼續活躍著，充滿著各種可能性。當他們在角落和罅隙之中享受著生活時，其實也表示出他們並不要因此威脅到工作和居留權。他們不斷透過象徵性的存在和在地的深化，展現出他們居住在此的權利。這是世界上不平等分配下微不足道的議

題罷了，可是移工卻是如履薄冰。現在每天的活動看上去似乎稀鬆平常，不過是一般經驗的匯集和少數的擴大而已，不過卻是真實地反抗著那些可能會孤立他們於無形的艱困環境。一旦這個社區生根下來，他們自己將會發現這樣的空間會如何地演化，如何開展出深刻的社會團結。■

> 歷史一隅： 不平等的女人 參與

by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UK, 出版副會長

若翻閱我們剛出版的「2010 Directory of Members」會發現，RC32 (Women in Society)是最大的研究委員會，總共有291人。這當然顯示出了女權運動的影響力，也彰顯了性別議題的重要性。以下我們用簡單的幾個量化數據來觀察ISA的這段歷史與潮流。

在執行委員會裡，1974年有第一位女性被選出，而她在1978被推選為副會長。之後又有2位女性加入，總共3人，這樣的狀況持續到1986年，才變成5人。她們之中的一位就是Margaret Archer，是第一位的女性會長(也是目前為止的唯一一位)。1990年代後期，女性人數是7人(共21人)，其中一位是副會長。2000年則有8-10位女性(共22人)，其中2-4人擔任過副會長。顯然，ISA的這個趨勢有著性別平等的方向邁進。

但是，我們不能把這個狀況解讀為是ISA的特色。這些女性學者來自世界各地，經歷過不同的社會變遷，也因為這個脈絡，她們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社會學者，並加入ISA。1976年的資料告訴我們：有22%的會員是女性，所以在執行委員會中有18%的代表，並不會太少。只是，她們就來自幾個特定的國家，像是在1970年之前的女性都來自英國或東歐。這也說明了在社會學已經在各國制度化之後所反映出的各種不同國情。

然而，ISA內各種社會分類不平等的會員結構，影響並不是很大。每個RC在Research Council都有一位代表，這意味著若是女性都集中到某幾個RC，那麼代表就會減少。同樣地，若是女性從少數的幾個國家來，那麼代表性也會降低，因為每個國家只有一個代表。

多數的RC32成員都是女性。2010年的成員中，從名字來看，我可以辨識出的男性大概只有10



Margaret Arche, 第一位ISA女性會長, 1986-1990

人。但是在其他的委員會，像是RC16 (sociological theory, 257人)，情況就不一樣了。這樣的變化反映出幾個特色，像是選擇不同的領域、和不同領域的關係等。這也應該有更多關於這段知識影響力的歷史研究，因為在非性別的領域內，這仍然不太被重視。■



倫敦陷入一片火海。

> 秩序中的 混亂

by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School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oimbra, 葡萄牙,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Law School, 美國, ISA橫濱世界大會計畫委員

在倫敦和英國的其他地方發生的暴動雖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絕非只是單獨的個案。對我們這個時代來說是一項警訊。當代社會中具有高度煽動性的憤怒通常都潛藏在我們無法預料的社會表層底下，像是家庭、社

區、組織、和政治。一旦被一點點的小事件點燃，就如同星火燎原般的擴散開來。如此的憤怒有4個要素：社會不平等和個人主義、個人和集體的商業化，化名為寬容的種族主義、以及被特權階級掠奪的民主制度。每個要素都

>>

有內在的矛盾性，一旦矛盾重疊，意外就會爆發。

> 不平等和個人主義

和新自由主義一樣，社會不平等已經不再是問題，而是解藥。富人階級的浮誇炫耀成為一種成功社會人物的典範，並同時瞧不起窮人和一般人民，因為他們認為這些人會那麼窮困是因為他們自己不努力。會有這樣的看法，完全是因為個人主義當道所致。而矛盾的是，個人主義卻是某種平等烏托邦的要素之一，例如，希望每一個都平等地取消社會團結。這裡的個體只有在平等降臨在他們身上的時候，他們才會認為那是個社會問題。這時，他們稱作這叫做不公平。

> 生活的商業化

消費社會意謂著將人與人的關係轉變成成人與商品的關係。和滿足需要不一樣的是，消費商品形成了一種無止盡的個人投資，無論是否擁有商品，都是如此。大型購物中心成為了一種社會關係鬼魅般的存在，社會關係始於商品，也終於商品。資本，即使它也渴望積累，但卻服從了市場商品的法則，認為

有些東西太過於平常(水、空氣)和個人(隱私、政治信仰)，而不適合在市場上交易。在相信金錢是普遍的媒介，和相信任何東西都可以得到，這兩種信念之間的差距比你我期待中的還要小。權力讓這兩者相安無事。然後窮人相信他們也可以用金錢得到所有的東西，但卻是以犯罪收場。

> 寬容的種族主義

英國的暴動事件從一開始就有種族主義的成份。相同的例子是1981年的動亂，以及2005年讓巴黎和其他的法國城市震驚許久的社會動盪。這些都不是巧合，而是社會殖民的體現。社會殖民總是發生在政治殖民之後。種族主義僅僅是原因之一，不同族群的年輕人都參與在這些動亂之中。可是這個因素很重要，因為它造成自尊的腐蝕，以及社會排除。換句話說，成為少數比匱乏還要嚴重。一個黑人青年天天都在經歷被質疑和被忽視的經驗。這樣的被社會質疑是很惡毒的，加上官方對抗歧視政策的偏離，虛假的多元文化主義，以及寬容的假象。一旦當大家忽視種族主義，那種族主義下的受害者就

被稱為種族主義者，然後再度被社會所敵視。

> 被掠奪的民主

在英國的動亂事件和被金融市場摧毀的福利體系之間，有什麼樣的共通性呢？他們同時用不確定的結果在測試著民主的秩序。那些參與暴動的年輕人是罪犯沒錯，但是我現在所面臨的不僅僅是總理 David Cameron 所稱的單純簡單的犯罪事件而已。我們正在面對的是社會和政治系統的制度性暴力：他們可以極盡所能地替銀行紓困，但是卻一點也不想替那些對未來絕望的年輕人想想辦法，不想昂貴的學費如何導致了失業率的上升。這些年輕人完全被社會所遺棄，然後反公共性的政策造成了龐大的社會冷漠、憤怒、忽視、混亂、暴力、以及恐懼，明天之後，煽動者只會宣稱他們所作所為和一切的暴力動亂無關。而真正的失序其實源自於掌權者。然後很快的他們就會學到教訓，重新掌控政治。■

> 英語和 社會科學的 霸權

by Renato Ortiz, State University of Campinas, 巴西

英語是全球化的官方語言。我之所以說「官方」，是因為其他語言的存在構成了當今的情況：只有英語高高在上。在全球的語言商品市場上，英語是全球現代性的代表。那麼，這對於社會科學來說有什麼啟示嗎？

在此我想要避免在爭辯之中常常出現的兩個立場。第一，英語的壟斷是帝國主義的產物，因為我不認為帝國主義是理解當今全球化的適當概念；第二，國族認同使得每個國家認為只有自己的語言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像是Saussure說的，符號的武斷和歷史與疆界的脈絡密不可分，沒有任何語言優於任何其他語言，每種語言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掌握這個世界。

有一種最庸俗的論點是：英語是學術界的國際性語言(lingua franca)。但什麼是lingua franca？它是一種沒有暗示、極大化溝通效果的一種語言。在自然科學界或許存在，但是英語絕對不可能是社會科學中的lingua franca。

這無關國族尊嚴，而關乎知識建構。社會學的研究對象透過語言而得以可能。使用什麼語言不可能無關緊要，而是會影響研究結果的。因此，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有很大的差別。讓我舉幾個例子吧。自然科學的文本除了有特別的安排順序之外，還有特別的敘述方式，總是以第三人稱和普遍的角度來呈現研究結果。例如，生物學家會說：「輻射的確描繪出了3個長條」，或是「變異明顯呈現出了自身的向心性」等等。動詞時態是現在式，使用第三人稱描述事物，沒有科學家的影子。然而社會科學的文本不可能把作者去掉，這也是為什麼C. Wright Mills會說社會科學是一種知識的技藝。作者可以是「我」或是「我們」，絕對不會是第三人。當我們用「我」或「我們」，就代表有中介者的存在。此外，翻譯也是問題。這展現在不僅是詞語之中，也在我們如何去找到兩個語言中相互對等的概念。而且在翻譯的過程之中，不同語言的知識傳統

是很重要的。像是「國族問題」不能被化約成「國族主義」，例如國族問題就是拉美政治脈絡下有很特殊意義的一種用法，這個脈絡包括了國族認同的問題意識、現代性的建構、以及邊緣現代性的困局等等。這個概念指出了我們一個整體的學術傳統：從墨西哥壁畫到巴西的現代性。國族問題只是一個拉美國加在尋找自身認同的歷史的濃縮而已，和國族主義一點也不一樣。

然而，儘管有些異議，但是英語在社會科學中的霸權地位仍屹立不搖。這裡面有一種全球性的科學風格在支持鞏固著英語的地位。例如，在使用資料庫的時候就是如此。資料依賴於各種因素而存在，像是技術、成本、市場等。而組織一個文本或引用需要最小化或甚至隱藏語言的因素，好讓資料庫可以呈現最科學的樣貌。科學資訊院(Institute for Science Information)有4種不同的目錄，每一種都經過不同語言的變更。在1980和1996在社會科學引用目錄(SSCI)中，英語出版的文章占了85%到96%之多。若我們都認為引用是建立科學權威來說是必要的話，那麼這個現象就指出了一種語言排除所造成的階層化現象。選擇以英語出版文章和書籍，以及建立資料庫，這完全是市場考量。最大的相關企業，如Reed Elsevier和Wolters Kluwer壟斷了全球市場，是因為書籍流通太簡單了。如此一來，武斷的語言標準變成了科學活動的正當性。這個武斷性也因為數位科技(PDF，引用)翻譯語言上的不均勻分配，而進一

>>

步被強化。在美國與英國，翻譯作品市占率不到5%，但到了荷蘭或是瑞典，數字就上升到25%，在希臘則是40%。換句話說，越是居於核心地位的語言，就越少來自其他語言翻譯成這種語言。

但若是英語不是社會科學的lingua franca，那麼為什麼稱英語擁有宰制的地位呢？我的理解是因為英語的無所不在，所以可以成為具有指

引知識辯論方向的全球性語言。指引的意思是去選擇議題，使得其被更廣泛地被看見。易言之，英語有權力去設定知識活動的議程。此外，ISA的創始者Eugene Garfield在1970年說法國科學有弱點，是因為用法文寫作。這個論點把普遍等同於英文，特殊等同於其他任何語言。全球英語變成了普遍的英語。大家彷彿忘記了：世

界主義不是全球化的屬性，而且個殊主義變成了在地的方言，也是當代全球化的定義的一部分。在全球現代性下，作為全球的地方性，它特別言之有理，也隨處可見。■

> 羅馬尼亞社會學

by Marian Preda and Liviu Chelcea,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羅馬尼亞

若以Michael Burawoy將社會學分為專業、批判、政策、公共社會學的角度說來，羅馬尼亞的社會學有很強的政策取向，並且其他三個面向也在進步當中。羅馬尼亞在19世紀就開始教授社會學，在兩次大戰間逐步發展出Bucharest社會學派(跨學科、以民族誌為主)。原本ISA世界大會要在Bucharest舉行，但是二次大戰開始之後就被取消了。1948年，社會學被禁止了，直到1966年才開放，可是，1977年又再度被列入黑名單。要等到1989年之後，許多學校的社會系才又開始成立，此後，有數以千計的學生拿到了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

過去20年來，羅馬尼亞的社會學培育出了3位勞工部長，1位首相，2位國會發言人，以及多位議員和高階的政治顧問。許多政治分析家、記者、民意調查公司、高階主管都將社會學得專業知識應用到公共場域之中。不過，對於羅馬尼亞如和與國際社會學展開對話的反思，只是最近不久的事情而已。在2010年於Gothenburg的世界大會召開之前，羅馬尼亞的社會學鮮少參與類似的國際性會議。這也符合了以下的趨勢：由SCImago所做的這份調查顯示，羅馬尼亞社會學在全球的貢獻程度，由1996年0.02%逐步上升到2008年的0.15%，2010年則是0.44%。(http://www.scimagojr.com/countrysearch.php?area=3300&country=RO&w=)

羅馬尼亞社會學除了在國際性的社會學期刊偶有發表之外(像是Current Sociology和Social Forces)，在參與國際性的期刊的創立與審查工作。例如，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Research (www.irsr.

eu)將要發表的特刊就是環境社會學、全球南方的物質文化和消費、社會經濟、生活風格、旅遊等，作者分別都是知名的社會學者，像是Jean-Claude Kaufmann, Michael Redclift, Zygmunt Bauman, 人類學家Richard Handler和Daniel Miller。

在2008年由許多位學者與非學院的人共同創立了一個新的專業組織，叫做「羅馬尼亞社會學會」(RSS) (http://societateasociologilor.ro/en)，迄今有超過400名會員。第一界大會於2010年在Cluj-Napoca召開，大會主題是「重現社會：新的風險與連帶」(http://cluj2010.wordpress.com/)，近200人與會，熱門議題包括遷徙、組織、都市、社會問題、政策、社會心理學，但是大家對於社會價值、調查方法與後社會主義轉型等問題也相當感興趣。

第二界大會名為「超越全球化？」將會在2012年6月舉辦，從2011年9月中開始邀稿(http://www.societateasociologilor.ro/en/conferences/conference2012)。這次會議將會對過去30年來社會學變遷的歷史做出觀察與反省。藉由幾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例如911事件和全球金融海嘯)，我們將探討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潮流是否會消逝與隕落。■

> 秘魯社會學的轉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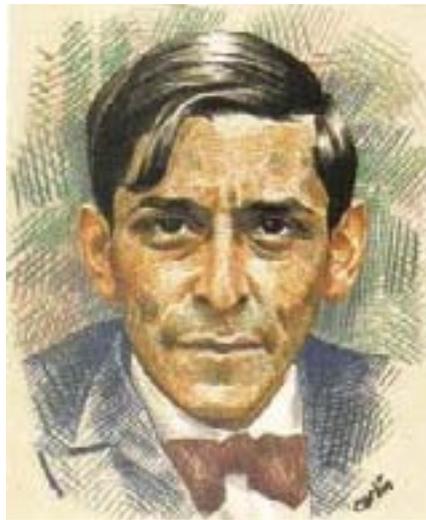
by Nicolás Lynch,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an Marcos, 前秘魯教育部長

秘魯的社會學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專業學問。然而它還沒有制度化，也未被受到重視。社會學在秘魯的發展有4個階段：關心社會議題、專業化、NGO裡的退化、回到批判社會學。

> 社會關懷

秘魯在世紀之交由於對於社會議題的關心，使得許多人展開了社會學知識上的反思。可是那個時候的文章都以診斷問題的形式出現，去診斷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發展與轉型的方向。在早期思想家已經開始去問關於秘魯的宏大問題。這裡面包括了支持寡頭統治的保守右翼人士，也包括了激進的左翼，一起去形塑這段知識的歷史。右翼包括了幾個重要的人物，像是José de la Riva Agüero, Francisco García Calderón和Víctor Andrés Belaúnde；左翼則有Manuel González Prada, 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和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在第一階段裡面，特別



|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1894–1930.

是1896年，社會學也出現在大學的課程裡面，例如the University of San Marcos的Department of Letters。作為課程的社會學相對較少去處理社會議題，不過它承襲了孔德和史賓賽的傳統，試圖以理論去解釋社會的發展。有趣的是反而因此社會關懷和社會學有了一點交集。不過接下來社會關懷倒是主導了社會學得發展。

> 社會學的專業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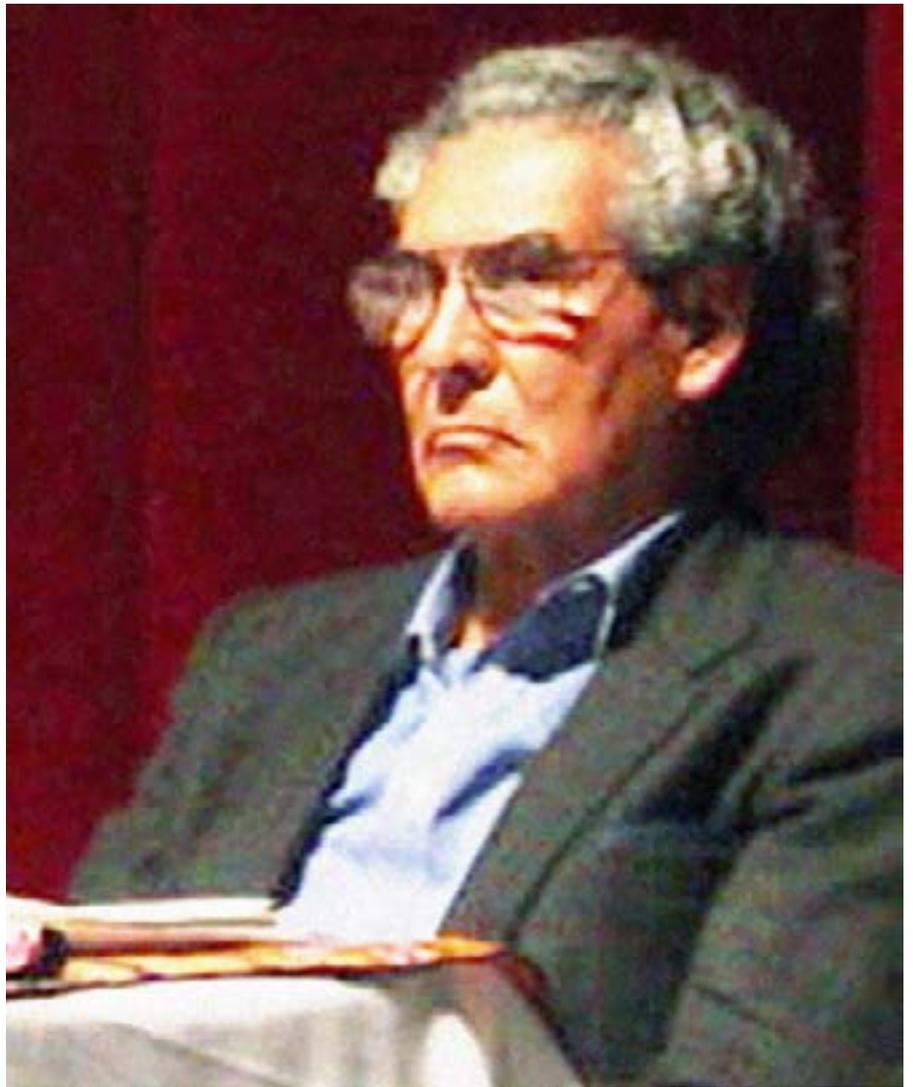
直到當代，1961年，隨著University of San Marcos的建

立，秘魯的社會學才成為專業學科。幾年之後的1964年Pontific Catholic University也成立了社會科學院，包括了社會學。來自國外的支持和影響也很重要：University of San Marcos有來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金資助，Catholic University則有來自荷蘭政府的援助。在一開始，結構功能論從美國引進，在研究和教學影響很深遠。而技術層面則是「以解決社會問題」為主。

但是，這個著重在解決問題的社會學後來則透過學生運動、左翼在拉美得擴展，轉移到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上，產生了很批判性的思考轉向。同時，民族主義、左翼政府的出現，軍政府的政變，雖然產生了獨裁統治，可是也產生了很多社會學的職缺。1968年對於秘魯來說意義重大，對世界上其他國家也是。這個轉變在接下來的數十年裡面讓社會學產生了革命性的認同，至少在新自由主義主在世界的1990年以前是這樣。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讓技術官僚退位，把社

會學當作是服務於革命社會轉型的學科。1970年代新的方向和勞動市場把秘魯的社會學帶到的巔峰。同時不僅僅各大學設立了社會系，社會學者還到政府機構裡任職，協助軍政的改革。這段期間通常被認為是革命性的社會轉變。社會學研究因此有重大的進展，特別是關於政治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問題上。社會學作為專業得到了高度的重視，體現了當時的時代的氛圍。

馬克思主義的訴求不僅僅從全球的角度來分析問題，還帶進了20世紀初期社會學進步的先驅José Carlos Mariátegui的作品。圍繞在此有個重要的爭辯，其中一位重要的人物是César Germaná和阿根廷社會學家José Aricó。他們不僅是社會學家，還是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可是馬克思主義儘管有所進展，不過還是有所侷限。特別是在由Aníbal Quijano主導的期刊Sociedad y Política (Society and Politics)上對於軍政府1970年代作為的分析中可以清楚看見這點。期刊El Zorro de Abajo (Zorro from Below)則由人類學家Carlos Iván Degregori主持，審查委員都幾乎是社會學家，也在1980年代相當重要。Sinesio López是其中一位最有影響力的編輯，他用Antonio Gramsci的理論去分析國家展和社會運動。此外，Julio Cotler則結合了馬克思主義和韋伯的取徑分析國家的形成，主要的一本書是Clases, Estado y Nación en el Perú，



| Aníbal Quijano.

其在1978年出版後就再版了好幾次。

馬克思列寧主義則是對於秘魯的社會學和社會科學影響很大。教條馬克思主義後來因為毛主義的共產運動的關係，被引進了秘魯。教條馬克思主義試圖去重新建構社會科學，要所有的老師都關心政治，限制引用文獻只能來自於蘇聯的科學院手冊，裡面只有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此時，政治上的暴力事件也在秘魯發生了。毛主義團體Sendero Luminoso的叛亂導致了秘魯12年的內戰，大約7萬人死亡，也讓社會學死了。許多公立或私

立的大學廢除了社會系，除了兩個仍然有一定的水準而沒有廢除社會系的學校：University of San Marcos and the Catholic University。隨著學科的瓦解，社會學家也面臨到生存上的困難。

>NGO中社會學的退縮

在1980和1990年，非政府組織開始成為了社會學得避難場所。NGO之所以是避風港，是因為這個時候正值內戰(1980)和Alberto Fujimori的獨裁統治(1990)。那個時代社會學與左翼站在一起，甚

>>

至與革命為伍，相當仇視專業。對於社會學的需要一下子減少很多。也如同前述，許多社會學系被關掉了。因此NGO就成立了，多少是為了把社會學家聚集在一塊，一起執行計畫，獲得國外的援助。這樣的形式讓很多社會學家以社會需求為導向而發展其知識。結果就是讓社會學家喪失了他們偉大的創意心靈，失去了更多的可能。從資金的來源就可以印證這點。多數的資金來自於世界銀行，並受到華盛頓共識的影響。這樣的霸權讓批判社會學被「賤民化」(subalternization)。貧窮完全取代了不平等一詞，這或許是解釋這個現象的最佳註腳。

不過也有正面一點的消息。1990年College of Peruvian Sociologists成立，是一個社會學家的專業組織，變成了社會學家和社會學的參考座標。這個正在發展中的組織已經把專業學者和應用學者聚集在一起討社會議題了。

> 回歸民主後的社會學

秘魯在2000年重回民主的懷抱，同時拉美政治也左轉，產生不小的衝擊。社會學在拉美又開始蓬勃發展，可是在秘魯並沒有，因為秘魯的民主政府並非左翼。在技術和批判社會學之間的緊張仍然繼續著，也因此批判社會學僅限於少數的知識分子圈子。不過在學院，不論是碩士或是博士學位，都有新概

念被創出。然而像是1970年代社會學得發展一樣，其實並不均勻。也有少數的論文是研究文化、都市、性別議題。教條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似乎要被永遠埋葬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個新典範誕生了，是由Aníbal Quijano從Immanuel Wallerstein那裡得來，稱為「權力殖民」。這個批判來自於José Carlos Mariátegui作品的延伸。Quijano認為秘魯加入了由大都市為主的資本主義行列，譴責這些大城市的共謀地位。以民族國家的架構為主，國家並不能認同自己的民族人民，並且維持歐洲中心主義的演化論。這樣的批判認為現代化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可能帶來發展。Quijano也提出了全球南方中地域的位置，也重申了在地人民的認同，建構出了自己的政治與經濟發展模式。這點現在看來特別中肯，提出了一個新的分析框架。除了Quijano之外還有許多其他人像是：César Germaná在方法論上的貢獻；Sinesio López在政治學和公民身份上的專業；Gonzalo Portocarrero和Pedro Pablo Ccopa以教育和文化為主；Alberto Adrianzén對於拉美左轉的分析。

> 結論

秘魯社會學在學術和專業上的發展其實相當有限。主宰性的思想仍然在蘊釀之中。制度性的發展大部分是受到大學的影響，許多都還在導論的階段而已，至今還沒有

研究中心，也沒有大型跨領域的計畫。雖然如此，秘魯社會學還是克服了許多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難關。通過這樣的考驗之後，讓秘魯社會更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有一點不要忘了，就是現今她還是以批判社會的型態出現。若可以把握這一個浮現脈絡的重要性，秘魯社會學會就會找到自身的區域自主性，在文化和政治上有進步的轉向。這需要新的發展和新的視野才得以可能實現。■

> Ulf Himmelstrand (1924-2011) : 奈及利亞社會學之父

by Ayodele Samuel Jegede, Professor and Head,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Ibadan, 奈及利亞 · ISA會員



紀念Ulf Himmelstrand. Ayodele Samuel Jegede. 攝影

美國、拉美、歐洲、亞洲的社會學家，像是：Sidney Verba (Stanford University)和Robert Sommer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奈及利亞的部份就是由Himmelstrand負責，同事也是該大學第一個大型的計畫。其田野涵蓋了1965-1967年各個地區的國家。很幸運的是，這樣大型研究計畫成了該系的傳統，傳承了下來。

現在很多知名的教授在以前都是他的學生。Peter Ekeh、Stephen Imoagene、Ekundayo Akeredolu-Ale、Samson Oke、Simi Afonja、Adesuwa Emovon、Martin Igbozurike、Layi Erinoshon等人是早期的學生。Adigun Agbaje和Eghosa Osaghae則是後來的學生，並合作寫了African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1994)。

毫無疑問的是他對社會學的影響相當深遠。他是ISA的會長(1978-82)，因為如此1978年在他的故鄉Uppsala舉辦了ISA的世界大會。

Himmelstrand是一位非洲主義者、理論家、某種意義上的實證主義者、專注在社會心理學得馬克思主義者，也是一位相當有傑出的學者，春風化雨且影響深遠。1989年他成為University of Uppsala的榮譽退休教授。6月12日他長眠於家鄉Uppsala，願他永遠安息。

奈及利亞的社會學之父Ulf Himmelstrand (1924-2011)於6月8號在他瑞典的家鄉Uppsala過逝，享年87歲。Himmelstrand在印度出生，由於父親職業的關係，雖然他有上過瑞典的中學，但是他還是在印度那裡度過大部份時間的童年生活。這也多少在兩個國家都造成他一些邊緣的位置。學術生涯的選擇讓他到了另一個國度，同時那邊也正在經歷一場社會崩潰：發生於奈及利亞的Biafran War期間，同時期美國加州也爆發學生運動1960年代。這些經驗都影響了他的社會學知識。

Himmelstrand的博士論文：Social pressures, attitudes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在1960年完成。在此之前他是University of Uppsala的講師，之後成為助理教授(1960-1964)。之後則是University of Ibadan的教授及系主任。

直到奈及利亞在1960年獨立以前，奈國的社會學的規模很小，也不過幾門在University of Ibadan和University of Nigeria (Nsukka)的殖民社會人類學課程而已。在偉大的Kenneth Dike (University of Ibadan第一任副校長)的政策之下，University of Ibadan 晉身世界級大學，並將

社會人類學去殖民化，積極引入正統的社會學近來。Kenneth Dike和Rockefeller Foundation合作，聘用了一位40歲的瑞典社會學家為社會系的系主任，那就是Ulf Himmelstrand。

他在1964年8月到任以前，他把自己的專長區分為斯里蘭卡和瑞典。到了University of Ibadan之後，他遇見了兩位優秀的同事：Francis Olu Okediji和Albert Imohiosen。另外還有英國社會人類學家Ruth Murray以及美國社會心理學家Paul Hare。他接任Peter Lloyd的位子，並且在社會系從經濟系獨立出來之後，Peter Lloyd一直是社會系主任，並留下了非常寶貴的傳統。此外，Himmelstrand 的第一屆博士生是Peter Ekeh和Stephen Imoagene (現在都是有名的教授了)。

Ulf Himmelstrand吸引了很多人前來念社會學。他把社會學去殖民化，引入主流知識，讓奈及利亞的文化更加尊重這門學問。Ulf Himmelstrand在第一年帶來了一個讓該大學甚至興奮的事情：一項國際計畫以及經費。1965年夏天，社會系舉辦了一個討論政治文化的國際會議，邀請到了很多知名的

> 遙想

Ulf Himmelstrand

by Margaret Archer, University of Warwick, 英國, 前ISA會長(1986-1990)

2011年6月8日，國際社會學界失去了一位既是紳士也是夥伴的同事，他是 Ulf Himmelstrand。對他來說，「全球化」一詞不僅僅只是個概念而已，他自己就生活在全球化之中。我想我們也不需要把他拿來和其他人比較，因為事實上，他在各方面的貢獻是需要彼此串連起來才可以見全貌的。在他於1960年代擔任系主任時最能證明這一點。他對奈及利亞和非洲的關懷大家有目共睹，而且他的貢獻也絕對不僅僅只是把社會學和人類學去殖民化而已。他透過教學、研究、課程，為的就是去作這件事情：平等且認真地去作育英才，把社會學引進奈及利亞。Peter Ekeh已經在他寫的的訃文之中清楚了表達了這點(The Guardian 26.06.2011)，並且我想所有人都會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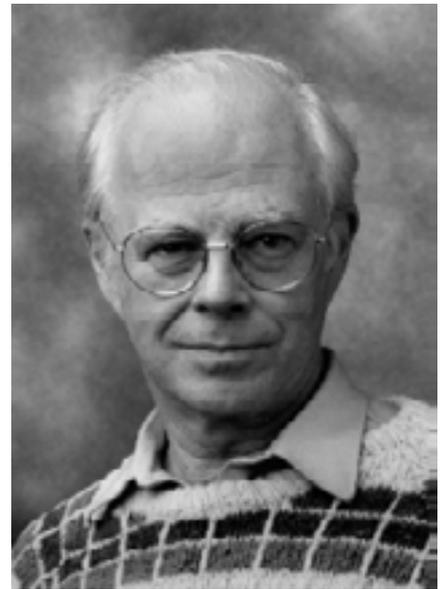
他的這份對非洲人民的關懷是很有韌性的。當4分之1世紀過去，他在一次定期的回訪之中被嚴重的襲擊而受傷之後，他從未表現出自私和指責他人的態度，只有相當平靜地描述他如何重新學習使用鍵盤、以便於可以繼續他的研究工作。

有一次，早在Roland Robertson發明「全球化」一詞之前，Ulf就生活在全球化之中了：往返故鄉Uppsala和Nigerian之間。相同地，作為ISA會長(1974-78)，他特別熱心地在故鄉舉辦了世界大會。他讓這場會議別開生面，並且讓瑞典和斯堪地那維亞地區見識到了何謂世界社會學。也因為他同時是理論家、功能論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所以他規劃在會議上讓大家激烈辯論Parsons和Poulantzas。這場會議沒有和任何場次衝突，並且在一個很大但是有點遠的地

方Aula展開。可惜的是，當數百人在雨中走到場地時，主持人大聲地讀了電報，說兩位主角不克前來了。大家聞訊後，只好往回走，我記得我當時全身淋濕，並且很生氣的發現後面居然還有一輛車跟蹤我。事實上，這輛車是Ulf Himmelstrand的，他正在開著車沿路關心是否有其他的落湯雞。

當他擔任ISA的會長時(1978-82)，由於我負責出版的部份，所以在工作上往來頻繁。常常執行委員會議會因為一些辯論而延長。我的經驗之中只有兩位ISA會長可以用紳士的理性去導引潛在的爆炸性：Tom Bottomore and Ulf Himmelstrand。Ulf擁有很特別東西去幫忙他工作：在幾天只有抽煙的日子裡，Ulf會坐一個特別的裝置後面：由八根管子組成，我從來沒有理解過那是什麼東西。好像是可以清理阻塞的器具(我還是沒辦法理解)，加上各種菸草罐。這些是舞台的道具，用來作某一種儀式的，根本和會議室沒有關係。一個理性的人絕對會想要知道有必要用這麼多器具和裝置來獲得心理的滿足。不過，這一點也不是重點。當情緒到了臨界點時，Ulf會很想要透過清理的管子去挖掘一些東西。這些年來我從來沒聽過他提高嗓子，也不曾聽他說過僅僅不著痛癢的論點。他帶領我們繼續前進。

Ulf不僅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在工作上和生活生都是如此。有一次他在英國講學，把腳踏車帶來。然後就在離牛津大學不遠的我家跟我打招呼。他從Open University騎腳踏車來，有60英里之遠，還帶了禮物來，是一本田園的英文詩集。當他來了一



| Ulf Himmelstrand, 1924-2011.

段時間以後，我的兩個小孩就會說：“Oolf”，“Oolf’s back!”

以朋友的角度來說，他總是不離不棄。他是在我於Madrid發表就職演說(1990)後第一個上前來看我的人，帶來的不是華麗的讚美，而是深深地擁抱。我得到他對新書的評論，而他從來沒有公開發表過。他也是少數幾位會從頭到尾把我的書看完的人。現在，他走了，離開我們，也留下了幾分惋惜，因為我從來沒機會告訴他我有多麼重視他這位朋友。若這份短短的紀念大多著墨在他這個人，而不是他對社會學的偉大貢獻。他的貢獻當然讓人望其項背，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他這個人之所以偉大，正式因為眾人皆普遍認為他是是一位慷慨仁慈的人。



> 挑戰南高加索的父權

by Gohar Shahnazaryan, Yerevan State University, 亞美尼亞



在Yerevan的剷除施加於女性的暴力之抗議活動。Gohar Shahnazaryan攝

1991年蘇聯政權垮台之後，開啟了亞美尼亞和南高加索女權運動的新挑戰。有了國際組織和資金的援助，非政府的女權組織終於成立了。2003年我們集結了一群亞美尼亞的年輕女性，一起討論在亞美尼亞，喬治亞，和亞賽拜然的女性所面臨的問題。不過，因為我們沒有辦公室，所以我們都選擇在首都Yerevan的都

市中心裡一間叫做Artbridge的咖啡店裡集會。在那一年之後我們就決定要找一個地方當作辦公室，為我們自己和其他被邊緣化、無法發聲的女性有個培力的場所。結果，這裡就成了亞美尼亞賽在後蘇聯時代的第一間年輕女性的資源中心。那時是在Yerevan State University的校園裡，隨時開放。

可是很快之後官僚的大學就對我們處處限制，像是要求我們晚上6點離開，禁止我們討論某些議題，例如性、健康的性，以及校園內的性騷擾。也因為如此，我們就被迫遷出校園，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非政府組織，叫做女性資源中心(www.womenofarmenia.org)。2006年起，我們就落腳在Yerevan，為各個年齡、教育程度

>>

、性傾向、社會背景的女性服務。許多人因為透過每個月舉辦的女權教育訓練課程而開始認識我們。在這個課程裡，我們討論性別歧視，父權、權力、暴力的共謀、性別建構的社會與文化基礎。除了工作坊、課程和刊物之外，我們也試著去喚起年輕人對於類似議題的關心，去解除後共產時代大眾對於公共參與的冷漠；所以，我們透過倡議、遊行、展覽、慶典等方式，試圖動員人們對於亞美尼亞和南高加索地區(包括喬治亞、亞塞拜然，以及三個衝突的地方：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南奧塞梯、阿布哈茲)的性別議題的關注。總之，我們的活動都圍繞在爭議性和禁忌性的議題上，像是女人的性、貞操、性暴力等等。例如在2008年我們辦了一個活動叫做「Burying the Red Apple」，Red Apple是一種父權的儀式，目的在於控制女人的身體自主權和性，迄今在鄉村還是可以見得到，用來象徵年輕出嫁女性的處女之身。在這個儀式裡面，新娘的家庭以及對方的家庭要在結婚後的第二天去探視新婚夫婦，以確定新娘是不是處女。若是的話，將會以得到一籃紅蘋果作為象徵。我們現在以很和平的方式在關注女性的身份角色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1990年之後，這個地區發生了三起有關的暴力戰爭事件。很遺憾的是現在的情勢是沒有戰爭就沒有和平可言。可是，結果卻是換來數以千計的女性，

包括難民，生活在憂鬱和創傷症候群的陰影之中。因此我們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成立了分會，給予心理上的支持以及醫療上的建議。此外，我們也和商業組織合作，讓這些女性可以有管道銷售自己製作的東西。為了化解戰爭留下的敵對狀態，我們也在伊斯坦堡和喬治亞等地舉辦活動，讓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人可以一起見面。

我們今年和來自喬治亞和亞塞拜然的同事一起弄了一個Vagina Monologu的公共閱讀活動。這個活動於2011年2月在Tbilisi (喬治亞首都)展開。起初我們其實很擔心大眾會不歡迎這樣的活動，可是後來很驚訝的是反應都還不錯，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大家都一起來聆聽女人遭受暴力、歧視的故事。一位參與者就這麼說道：「真不敢相信，在這裡我聽到了各種語言，也聽到了各種和性、身體、生育、強暴、探索等等的故事，但是也都共享著一定程度的歷史經驗。彷彿就像大家的故事模糊了每一位參與者之間的國族疆界一樣。」我們最引以為傲的一項成就，就是成功起草了關於亞美尼亞性暴力的法案。現在該法案在議會中，我們希望可以在秋季的會期中通過。現行的法律對於性暴力或性攻擊行為毫無規範能力。

不過我們還有重重障礙要克服，很大一個因素是由於我們總是以女性主義者自居，所以被人們以為是激進和挑戰傳統父

權的始作俑者。當其他人聽到說亞美尼亞的女權運動不是來自於歐美、而是根植於自身早在6、7世紀就把性別平等寫進法律之中的這樣的一個歷史之後，都大吃一驚。不過，敵意除了來自外界之外，女權運動內部也有緊張關係。很不幸的是在後共產主義世界裡面，幾乎每個地方的女權運動都被共產黨內的女權運動者壟斷了，這樣一來的結果使得女權運動不斷地再生產共產時代的父權遺緒以及威權領導方式，這抹煞掉了很多創意與自由。此外，老一輩和新生代的運動者之間對於什麼是公民、草根、運動的認識上也存在很大的落差，老一輩的人現在多在NGO裡面，而新生代的人多在較為平等民主的運動組織裡面。所以，現在我們的工作是繼續強化我們的位置和自信，讓年輕女性對於女人的權力和性別平等相關的議題可以有更多的參與和認識。■

> 勾勒人文社會科學的未來願景： 來自南非的觀點

by Ari Sitas,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前ISA副會長；Sarah Mosoetsa,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南非

南非高等教育部長Blade Nzimande委託社會學家Ari Sitas和Sarah Mosoetsa規劃和構想人文社會科學的未來。全球對話希望我可以對這個大膽的願景作個整理，介紹給大家。報告全文可見：www.charterforhumanities.co.za

當全世界的人文及社會學科都面臨到發展的壓力的時候，南非正在著手規劃人文社會科學的新憲章(HSS)，用意是想更活絡既有的學科，為高等教育注入活力。我們在草擬這個新計畫的時候，特別注意不要重複已知的許多問題。我們不希望僅僅停留在對過去歷史的修正上，亦即努力抹掉種族隔離的歷史遺跡，而是還希望可以對未來的世界提供一個適合的發展藍圖。

當我們的國家第三級教育部門要求在教育之中踏出後種族隔離時代的第一步時，有一個重點，那就是我們對於這樣的要求要如何快速的做出回應。就如同Manuel Castells在「資訊時代」(1998)第3冊中所說的一樣，「全球化的動態經濟已經建立起來了，把世界上所有有價值的人事物連結起來，開起了權力和財富的網絡，從宰制階級的利益而言，人民和領土彷彿一點也不相干」。

Castells所描繪的景象，對於那些仍然活在「第四世界」中、完全被排除在外的人來說，顯得相當恐怖。之前，南非的政治領導階層對於完全陷入資訊資本主義黑洞之中的想像，覺得難以置信。因此，必需要不計代價地避免這個悲慘命運，一點也不能妥協。對於那些呼籲要求要從非洲悲情主義中走出來的人士來說，作法就是我們自己解救自己。結果，政策上的回應就是優先發展科技，也就是讓學術作為經濟成長的基地。

HSS的重要性被低估了，相關

的學術成果被忽略，貢獻也被邊緣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政府在獎助政策上的偏見，並且逐步朝向John Higgins筆下所謂的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模型，好有利於研究成果的量產。這個模型並不知道什麼是HSS。對於這個模型的批判相當有力，就像其他對於高等教育企業化的批評一樣。當我們在和上千個大學院校、政府或社會上的利益團體接觸過之後，我們深深確信：我們會是南非在追求和平、安全、幸福這條道路上，重要歷史、遺產、與記憶的乘載者。

在經過仔細的分析和思考之後，我們做出了一系列的建言，主要有6項關鍵性的介行動，並且在2的階段中執行：第一階段：2012 - 2011；第二階段：2015 - 2018。

- 人文社會科學的學院/制度/組織的形成：有一個特別的制度去活化研究活動，分別在5個主要學校中進行；第二階段則是4所學校。這些學校必須在指定的行政區域。

- 非洲文藝復興計畫：這會是一個全非洲的計畫，就像歐盟的Socrate和Erasmus Programs一樣。

- 終身教育機會中心的建置：為了公平、保障就業與機會。

- 6項連鎖計畫的鞏固：在第一階段，會刺激HSS領域的發展。

- 新架構和規則的創立：這是為了學科整合的必要。

- 14項矯正介行動的實踐：在第一階段執行，為了永遠克服現

今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既存的危機。

我們認為，若是上述的建議都能落實，那麼，我們將可以預見在2030年，人文社會科學將會是非洲學術、教育、社會、責任的中心。

我們也可以預料到，我們的學院和制度在全球北方和南方將會擁有對等的夥伴，一起成為世界知識生產與傳播貢獻心力。我們也瞭解到教育和研究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所以也會提出建議，去讓我們的系統可以在變遷中更加活躍。

總之，我們是要建立非洲的學術重鎮、全球倡議的夥伴、以及進步與變遷的中心。非洲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委員會(The 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Africa, CODESRIA)若是樂見這樣一個全非洲的人文社會科學新憲章的誕生，那將會是莫大的鼓舞。■

> ISA的社會學新鮮人¹

by Emma Porio,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菲律賓, ISA執行委員

在第17屆世界大會於2010年召開之後，新任的會長Michael Burawoy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ISA的會學家新面孔(early career sociologists)。本篇就是對ISA學生會員所作之調查的初步報告，也是本委員會今年於墨西哥的執行委員會議所作報告的結論。

資料來源：本委員會的報告資料來源如下：(1)對ISA學生會員所做的電子問卷(由ISA秘書處執行問卷調查，大約30%的問卷回收率)；(2)從2000年到2009年PhD Laboratory獎得主以及其後續的會員資格情況；(3)之前PhD Lab的紀錄，以及青年社會學網絡(JSN)的會員及非會員；(4)JSN的e-group；(5)PhD Lab負責人員；(6)JSN和ISA前後會長Michel Wieviorka和Michael Burawoy的對話。電子問卷以社會人口學得變項為主(年齡、性別、博士畢業年度、地址、研究所就讀國家、大學畢業年度、就業狀態等等)。

那麼，誰是ISA的社會學新血輪呢？在5053位ISA會員中，830人(16%)是新人，也就是說，他們是以學生身份加入ISA，且多數正在工讀碩士或是博士學位，並且最多4年內可以拿到學位。若從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而言，有507位來自A類國家、245位來自B類國家，78位來自C類國家。

填答問卷的253位受訪者中，138位女性(56%)，115位男性(45%)。大多數(80%)是博士生，其中有些人最近已經拿到博士學位(14%)及碩士學位(4%)。值得一提的是這裡面只有1個人大學

生。此外，大多數人都在自己的國家念學位。有54%的博士生和78%已經取得學位的人回答已經拿到穩定的工作，而碩士的狀況則只有50%。

ISA新會員的來源，最大宗是來自於PhD Lab (130人)或是得獎者，以及青年社會學家國際競賽(World Competition for Junior Sociologist)的最後名單(約45人)。不過在130人的PhD Lab成員之中，只有半數64人曾經參加過ISA (2000-2009年)，而且僅僅34人在2010年11月繼續會員資格。

在第16屆世界大會上(Durban, 2006)，青年社會學家工作坊的參加者組成了青年社會學家網絡(JSN)，從此之後，他們非常積極地舉辦活動，像是在2010年的世界大會和2008年Barcelona論壇都舉辦特別的場次。可是，就像其他人一樣，他們面臨到資源不足的困境。因此，他們將會像他們的活動一樣，受到很多人的支持，更整合到ISA之中。

本委員會基於問卷調查和對JSN的訪談，對ISA提供以下的建議：

1. 舉辦迎新，歡迎這些社會學新人。像是在2012 Buenos Aires論壇，或是2014橫濱的世界大會。藉此他們可以和其他中生代或是年長的社會學者有交流見面的機會。
2. JSN所舉辦的活動應該被整合到ISA的例行事務之中。
3. 對於新人所辦的生涯發展會議或工作坊(例如如何發表文章到期刊、如何撰寫評論等等)

也應該是ISA的例行全球事務。

4. ISA的領導階層應該積極鼓勵研究委員會、主題工作組織、國家會學、以及其他團體會員，在所有ISA相關的場合，去支持這些社會學新鮮人。(從財務及會員委員會那邊的資料得知，研究委員會和主題工作組織會優先給B類和C類國家的成員ISA會議的旅行獎助，特別是新人。)

5. 社會學家國際競賽和PhD Lab的組織者應該多多鼓勵成員加入ISA。

6. 參加任何ISA會議的社會學新鮮人，秘書處應該要密切關心，否則會失去聯絡。

7. ISA的組織章程應該修改，以強調招募社會學新鮮人至ISA的重要性。■

¹我們用「社會學新鮮人」是因為有些人並非年輕人，但是卻是這個領域的初生之犢。

> Women's Worlds

by Ann Denis, University of Ottawa, Canada, President RC05, ISA前研究副會長

Women's Worlds是一個跨學科的國際性會議，每3年舉行一次，協辦單位是Carleton University和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Université d'Ottawa)，並由 Université du Québec en Outaouais 和 St. Paul University所贊助支持。今年的會議於7月3-7日在Ottawa-Gatineau舉行。有2000人註冊，約800名到場，來自世界各地92個國家，非常具有國際性。會議的每一天都有很多場次(每一天的三個時段都各有將近30個場次)。與會者有來自學術界的，也有來自於社運界，彼此交流對於女人的現身(或缺席)的多元觀點。這毫無疑問是一個絕佳的對話與學習的機會。

今年大會的主題是「連結與對話。包容、排除、孤立：全球化時代的生活」。也因為如此，多元性和國際性是會議焦點。每天安排有一個主題，breaking cycles, breaking ceilings, breaking barriers, breaking ground。主題涵蓋

從女性的挑戰和限制，到女性的創造和包容，以及邁向更平等的未來。每個主題之下的場次包括了小額信貸、愛滋病、對女性的暴力、藝術等等。進行的方式除了以傳統的報告之外，也有針對結構式主題的對話形式。有些主持人把討論聚焦在參與者身上，有時則放在女人的自主性上。

今年Women's Worlds的一向特色是：會議以三種語言(英、法、西)進行。口譯並不多，有些場次只有雙語，若需要的話有非正式的口譯；有些則只有一種語言。此外，大會也有考慮到行動或是其他方面不便的人士，提供口語或是輪椅。也特別為年輕女性和原住民著想。所以很明顯的可以看到會議的包容性和豐富性。最後要強調的是，本會議是一場國際性的，學界與行動界的對話與交流。

上述我都把焦點放在會議的形式和結構上，並未針對內容進行討論，理由在於，我想呈現給大家當

時大會進行的整體氛圍，而不是挑選幾個特定主題介紹而已。

ISA的RC32成員：Women in Society一直是這個會議的積極參與者，今年當然也不例外。她們除了組織了RC32的brown bag lunch進行資訊交流、在WW11 Bazaar上設立一個資訊看板之外，RC32的主席Evie Tastsoglou也製作了一個Women in Society參與Women's Worlds的名單(現在在ISA的網站上)，方便大家跟各個成員聯絡，也藉此介紹RC32。

更多關於Women's Worlds的資訊，像是影片、論壇、會議資訊等，請到<http://www.womensworlds.ca>。下一屆會議將在3年後(2014)舉行。我想就如同我從1993年到現在共參與過4次的經驗，下一次必定也是相當具有啟發性與活力充沛的女人聚會！■

> 日益茁壯的巴西社會學

by Elisa P. Reis, Fede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Brazil, 前ISA執行委員



Curitiba的巴西社會學大會。Elisa Reis攝。

第15屆巴西社會學(SBS)大會於2011年7月26-29日在Curitiba舉行。約2000名社會學家在Paraná齊聚一堂。Paraná以其成功的創新都市計畫文明。大會主題是「變遷、延續和社會學得挑戰」，會長Celi Scalonu也持類似觀點，他在演講中說社會學是一門不斷被自己的歷史所挑戰的學科。整個會議也邀請與會者把握這個機會，對理論和方法的資源做出最好的判斷，為將來的公共角色作準備。大會把各個會議主題做了很好的結合，讓國內的社會學者和海外學者可以有更進一步的交流。主題演講者給了我們很多元的想

像。Margaret Archer, Seyla Benhabib、Robert Mare、Tom Dwyer、Werneck Vianna、Maria Nazareth Wanderley等人也開啟了許多有趣的理論和方法論的討論。Werneck Vianna是唯一獲得終身成就獎的學者，發表了題為「社會、政治與法律」的演講，討論在巴西舊政府的法律制度與過程，以及邁向現代性的進程，還有民主經驗。Maria Nazareth Wanderley。而另外一位得獎人則是以經濟理論關係為題演說。這次大會包括了6場主題演講，七個論壇，3個特別主題，31個圓桌會議，有超過32個研究團體參加

。不過最讓人興奮的還是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來，他們的熱情和理念，大大刺激了會議的辯論。巴西社會學在1950年建立，迄今已走過很長了一段路。在政治大動盪之後，SBS再度充滿活力，而那時正值剛開的民主化，爾後，會員人數就穩定成長。我是前SBS的秘書，見證了在1980之後巴西社會學的進步。從這次大會我們可以發現：巴西的社會學越來越繁榮，且學會會員也都清楚對國家的理念，和全世界的學者做出連結。■